

海外口述歷史進程及其對大陸圖書館的啟示

鄭松輝

汕頭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廣東汕頭

摘要

口述歷史，簡單地說就是搜集、傳播口頭史料、并以此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的方法，通過瞭解歷史真相，從而認識歷史的本來面貌。本文回顧了海外口述史學研究經歷的階段。分析了大陸圖書館口述歷史工作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作者認為這項工作有助于補充既有文獻的不是，豐富館藏文獻資源，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關鍵詞：歷史發展進程，口述歷史，海外，啟示，大陸圖書館

一、什麼是「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的英文是 Oral History，或稱 History by word of Mouth。這一術語正式產生于 20 世紀 40 年代。口述歷史是歷史事件或歷史進程當事人對其親歷事件或過程的回憶。從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看，在文字發明以前，口耳相傳是人類對自身發展和文明進程最早的記憶及傳承方式。按照國際學術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口述歷史指的是由準備完善的訪談者，以筆錄、錄音或錄像的方式，收集、整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註1)。

從西方的「荷馬史詩」，到大陸燧人氏鑽木取火的傳說，大批史前文明的精華在口耳相傳中得以記憶和保存下來。對於什麼是口述歷史，在整個口述歷史學界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阿蘭·奈文斯(Allan Nevins)的同事和學術繼承人劉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說：口述歷史是通過有準備，以錄音機為工具的採訪，記述人們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價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數據(註2)。美國著名的口述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他的口述史學專著「做口述史」(Doing Oral History)有一段論述：簡單地說，口述歷史就是通過錄音訪談來收集口頭回憶和重大歷史(註3)。國際口述歷史學界權威，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社會學教授保羅·湯普遜則認為，口述歷史是關於人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口頭故事的記錄(註4)。對於口述歷史，大陸學者也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鍾少華先生認為：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都是口述史料，將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歷史專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楊立文教授則認為：口述歷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對於文字數據而言，就是收集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口頭資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調查訪問，採用口述手記的方式收集資料，經與文本文件核實，整理成為文字稿（註5）。

但是，學術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是由美國的現代史學家艾倫·芮文斯于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在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通過訪談方式收集了大量關於解放前的口述歷史資料。各級中共黨史研究室也開展了大量的口述歷史訪談記錄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口述歷史學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明顯的表現是和國際口述歷史學界開始接軌。1987年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新興科學百科知識」就專門介紹了什麼是「口述歷史學」。近幾年科技手段的發展諸如錄音機、攝影機、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為中國口述歷史學的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這時期的許多口述歷史學工作者也開始從事國際正規的口述歷史實踐。

口述歷史乃是由歷史學發展出來的方法，嚴格地說，它必須要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的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像的方式紀錄下彼此的問與答。訪談的錄音（影）待經過製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式後，儲存在圖書館。

從上述諸多學者對口述歷史的理解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首先是使用錄音機問題，很明顯，斯塔爾、唐納德和鍾少華等人認為必須使用錄音機；而楊立文卻認為不一定需要錄音機，他是從收集數據的角度來理解的。筆者覺得是否使用錄音機不應該成為判斷是否是口述歷史的依據，因為各國的情況都不同，比如50、60年代的美國口述歷史工作者經廣泛地使用了錄音機，而在同時期的中國、非洲等國家和地區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另外一點是口述歷史研究對象的差異。這突出地表現在英美口述史學發展初期的研究方向上。美國注重研究重大歷史事件和顯要人物；而英國則側重於社會歷史尤其普通民眾的口述究（註6）。

二、海外口述歷史的發展

隨著文字的發明和傳承媒介的日益多樣化，人們記述歷史的方式更多地依賴文字的記載，但對口述歷史的採集和研究並沒有銷聲匿跡。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們對歷史的研究領域日益廣闊，而傳統的檔案史料顯然無法全面反映紛繁複雜的歷史萬象，口述歷史作為對檔案材料的重要補充，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通過訪談、口述搜集歷史資料，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設有專門為史官搜集人們言談內容的書記，所謂「動則左使書之，言則右使書之」。這些書記主要是記載君王的言行舉止，而不是普通社會的歷史，但到

漢代，確實已運用訪談、口述的方法來搜集史料。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之前，曾四出訪問，請年長者述其見聞。西方的「荷馬史詩」、「馬可·波羅遊記」是眾所周知的口述史書，藏族的「格薩爾王傳」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諾的「西行漫記」、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歷史。所以，唐德剛曾對芮文斯說：你不是口述歷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詞的發明人，口述歷史是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註7）。

現代口述歷史起于1930年代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隨著其研究方法的日益完善和規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世界公認的口述歷史重鎮。該校兩位研究中國歷史的教授，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與何廉(Franklin L. Ho)，從1958年開始，有計劃地對留寓美國的中國軍政要人進行訪談。1953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立了類似的口述歷史檔案館。1967年，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正式成立。1980年，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提出一套評介口述歷史的標準，除了制定工作原則和標準，厘清口述歷史的專業倫理，說明從業者應有的操守外，規定了口述歷史工作者對受訪者以及社會公眾應盡的義務，還對口述歷史贊助機構和檔案機構的義務作了規定（註8）。在美國各州，收藏口述歷史數據的博物館、圖書館隨處可見。美國之外，歐美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相應的機構，專事口述史工作。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都有全國性的口述歷史組織，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歷史雜誌和書籍（註9）。英國圖書館國家聲音檔案館是世界上最大的聲音檔案館之一，目前已經成為英國口述歷史的收藏中心。它不僅開展一系列的口述歷史工作，而且舉辦各種各樣的培訓班，講授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問題。口述歷史學會成立于1973年，是一個致力于推動口述歷史收集和保存以及研究口述史學自身理論和方法問題的國家性和國際性組織（其官方網站：<http://www.oralhistory.org.uk>）。他為推動英國口述史學的發展和口述史學的國際聯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他和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隆納德·格雷爾(Ronald J. Grele)的倡導下，于1979年在英國成立了國際口述歷史協會(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1987年，國際口述歷史協會在英國牛津成立，以後定期在歐洲各地集會。

在亞洲，新加坡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以後，因其歷史短，特別重視口述歷史工作。1985年，口述歷史組升格為檔案與口述歷史館，組織專門人員從事口述歷史工作。開頭10年中，該館已訪問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時的錄音，有錄音帶一萬多盒（註10）。新加坡國家口述歷史中心負責保管國家的歷史，它通過訪談錄音的方法編整、保存及傳播人們對新加坡早期歷史的集體回憶。目前，新加坡國家口述歷史中心已出版刊物、目錄冊、視聽教材多種，並成立了檔案與口述歷史諮詢委員會。

香港博物館自1980年代開始從事口述歷史工作（註11）。1987年，香港學術界在「香港學」的研究中成立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為主題的口述歷史計畫執行小組，

由香港博物館牽頭，以一名全職研究員及一名兼職研究助理參與，香港大學歷史系香港歷史研究室主任冼玉儀博士任顧問，指導口述歷史的進行。

日本學者在口述歷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當可觀，單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會，對於1945年以前日本在滬居留民歷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關城市作了大量訪談工作，搜集了許多口述資料。

臺灣史學界對口述歷史起步甚早，成果相當豐碩。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雲龍等開始了訪談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計畫」合作。並成立了口述歷史小組，有條不紊地推進口述歷史計畫。迄今為止，近代史所已訪談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萬字，整理出版了「口述歷史叢書」70餘種，定期出版「口述歷史」期刊，舉辦「口述歷史研習營」，推廣、培訓口述歷史工作者。近些年來，臺灣史學界在口述歷史方面已蔚成風氣。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歷史都有組織和活動。保爾·湯普遜在他的名著「過去的聲音——口述史」，具體而有分析地介紹了口述歷史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註12）。

我國大陸學術界早在1950年代，已採用社會調查和口述歷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資料。50～60年代，全國各地對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事件的「實地調查」，搜集口碑材料，使用的就是口述歷史的方法。全國各地設立文史資料館，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種各樣文史資料選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1956年創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資料的重要性。1978年以後，口述歷史日益引起大陸史學界和出版界的關注。北京大學出版社適時地推出了「口述自傳叢書」，頗受書界好評。儘管口述歷史在我國學術界已有一定成果，發展趨勢也不錯，但是，從總體上說，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體現在重點課題規劃、科研經費撥發、雜誌創辦、學會組織等方面，口述歷史都還沒有自己恰當的地位。當前在我國，文史資料事業已是成績斐然，深入發展。在當代人寫當代事的道路上繼續邁進：口述歷史資料，則是早有起步，方興未艾，仍將繼續成為理論研究的門類之一。

在大陸圖書館界對於口述歷史資料的收集工作目前認識還比較模糊，而開展此項工作的圖書館更是少，所幸的是個別圖書館已開始啟動這項工作，其中汕頭大學圖書館在大陸圖書館中正式把口述歷史資料採集作為日常工作。

汕頭大學是李嘉誠基金會重點支持的項目，是潮汕地區一千萬人口中唯一的一所綜合大學，大力推動社會經濟、文化與科學發展，走在全國教育改革前沿。汕頭大學近年在潮汕文化推廣和研究方面也取得理想成績，先後發表了二十多篇有關論文，圖書館更設立「潮汕特藏館」，收集及整理潮汕文化資源。有計劃地開展「口述歷史」、「人物訪談」工作，有針對性的訪問潮學研究學者或在潮汕文化方面有代表

性人物，并積累相關的資料。繼續開展民俗數據的田野采風工作，拍攝和編輯幾套潮汕民俗或民居等的照片資料。主動開展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結合本館館藏的性質、自身工作的需要，確定訪談者、訪談內容與史學界的研究相比，這部分的史料收集可以沒有較明確的課題限制，隨機性較強。如該館特藏組，主要負責收集潮汕地區的文獻史料，圍繞潮汕文獻的特殊性逐步開展了多項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在已籌建的口述歷史資料數據庫中，有對研究潮學的專業學者林倫倫等人的訪談，有潮汕地區的民間音樂家，有本地區某一歷史事件當事人的經歷和感受，有對潮學有濃厚興趣并有一定研究的國際友人，也有海外潮人後裔對海外潮人社團活動概況的介紹等，從各個層面來豐富潮汕文獻的史料收藏，揭示潮汕地區的人文發展情況，也使讀者、學者對潮汕地區、潮汕文化有一個更為感性、更為真實的認識。到目前為止，開始口述歷史數據庫的建設，陸陸續續訪問了多位代表人物，積累了一些口述錄音數據，并已將其中的部分潮汕話整理成文字。

三、對圖書館的啟示及功用

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研究學者認為口述訪談所得的史料，與其他文獻史料一樣，當然都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最大的價值在于對當代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以補充文獻數據的不足，解決文獻數據的不足，得到文獻資料難以獲得的滿足。口述歷史通常被用來記錄當代重要歷史事件中人物的回憶，以作為那個時代與事件的證據。相對於主流一元的史觀，口述歷史具有彌補歷史斷層及型塑社會共同記憶等功用。正如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家隆納德·格雷爾所說，「口述歷史學是對親眼看到并參加過去事件中的人的採訪，目的是要重現歷史。它是一種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紀歷史的研究方法。」(註13)首先，它可以用來改變歷史本身的焦點，拓寬歷史的研究領域；填補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經歷中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空白，或至少彌補其不足。其次，口述歷史學除了填補記載的空白外，它還可以印證文獻數據的可靠性。口述歷史更為仔細地、生動地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它們提供對過去事件的主觀或個人理解的豐富證據：面對結婚、火災以及在集中營面臨死亡的感受。」(註14)再次，口述歷史學為歷史學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

當然，除了這些特性為人所共知之外，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建構歷史的方法經常必須受到一些質疑，在肯定口述歷史的價值的同時，從事此項工作的學者，亦提出口述歷史史料價值的局限。口述歷史既然是史學研究及史料搜集的方法，因此，必須受史學方法的檢視；內容是否屬實，則須透過多方數據的排比考證。

「口述史學：跨學科文集」主編維拉·鮑姆(Willa K. Baum)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歷史辦公室主任。她是美國口述歷史協會的發起成員之一，以倡導口述歷史與圖書館的聯合聞名。「口述史學應用：地方史、族裔史、家庭史和婦女史」和「口述史學和相關學科：民俗學、人類學、媒體和圖書館學」(註15)。

臺灣圖書館學專家宋雪芳和許世瑩，在「搶救過去的記憶：口述歷史應用在圖書館之探析」分析美國與臺灣的圖書館界從事口述歷史的情況，以喚起圖書館界同仁搶救圖書館歷史的危機意識，免于日後這些活歷史渺茫難覓的遺憾（註16）。

從海外口述歷史研究和實踐成果發現，口述歷史數據對圖書館的作用和優越性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可以豐富館藏，建立比較合理的館藏結構。圖書館作為文獻收藏單位，採集保存的大量口述歷史數據，但這些數據一般是從出版機構、政府機關、宗教團體、研究機構、家族和同鄉會、學校、私人和商業收集的，其文字和照片只能反映一個概貌，不齊全，往往是著作者的一家之言，特別是一些大的歷史事件在民間的影響和反應，還有一些民間經濟、文藝和優良傳統、風俗習慣等等，很難在圖書館的藏書裡反映出來，而口述歷史資料則彌補了這個不足，豐富了館藏，使館藏歷史數據結構比較合理。

目前許多國家都在進行口述歷史的搜集工作，根據美國著名檔案學家莫斯的問卷調查，已開展口述工作的就有48個國家或機構。僅據美國9個總統圖書館1973年到1989年9月30日的統計，這些圖書館館藏的口述檔案文字材料已有19.07萬頁，錄音磁帶已有6688小時。許多學者認為：圖書檔案部門保存的口述檔案的內容，一般都是其他檔案材料中所不能反映的內容，因而這些材料都很珍貴，其利用率一般都是很高的。例如，記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口述材料「威爾遜日記」，就是我國檔案材料所不及的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進行此項工作已經有55年的歷史。張學良將軍生前曾對諸多媒體和中外學者作過多次口述歷史。從1990年到1996年，他在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裡，和哥大進行了數十次談話，最終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口述歷史。這是他在恢復自由以後所進行的若干次歷史回顧中，最為浩大的一次口述歷史。2001年在美國擔任採訪任務的一位新華社特派記者，採訪了哥大口述歷史部和珍本手稿部負責人阿什頓博士，她向記者談到哥大採訪班子最傑出的歷史學博士蘇張之丙充任了最主要的任務。她說：目前採訪記錄已經收齊，全部工程是要將總共145盒錄音帶整理成中文。由于訪談中採取了以當事人的錄音、錄像的方法，較之單純的文字記錄更為翔實和可靠，這些重要史料勿庸置疑是彌足珍貴的。綜上所述，口述檔案、口述歷史、口頭傳說作為記錄歷史真跡的重要方式，是應該納入圖書檔案部門的收藏涵蓋範圍。

二是可以滿足社會需要，更好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新加坡建立口述歷史中心，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瞭解國家歷史的需要，對人們特別是下一代進行更生動具體的愛國主義教育。從已出版的「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消失中的行業」等目錄冊，「口述歷史手冊」、「抹不去的戰爭摘錄人們對戰後新加坡的回憶」、「超越帝國的覺醒」、「日治時期1942-1945年」等等出版的刊物，以及「新加坡的淪陷1942-1945年」、「日治時期的糧食控制1942-1945年」、「新加坡的猶太人」、「掌中乾坤——一個掌中戲師傅的藝術」、「華旗歌謠集」、「巫族歌謠集」、「印族歌謠集」等完成的視聽教

材，可以看出口述歷史資料的作用。口述歷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創建到今天屈指數來不過半個世紀，但其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口述歷史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概括。首先，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長期以來都將目光投向文獻史料，而口述歷史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舊有模式，向幾千年的傳統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其次，口述歷史是現代歷史科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研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具有頗為濃厚的「後現代」色彩；再者，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正所謂「英雄創造歷史」。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呼喚著史學研究出現新的變革。從另一個角度講，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體，因此，那種無視普通民眾的史學研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從這些意義上說，口述歷史的影響無異于一場革命。毋寧說，這一革命還在繼續。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革命的結果。

每個地區的人民群眾都以本地區擁有與別地不同的獨特之處而驕傲，並樂於保持這種本地的特色，人們茶餘飯後常常津津樂道于本地的風土人情、人物事蹟、歷史掌故，這已經構成人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們還常從地方文獻中擷取這方面的內容進行考證，以滿足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地方文化的物質層面包括一個地方獨特的自然環境及資源、勞動者、生產工具、生產方式以及由其結合而產生的各種物質財富。顯然，由于各地自然條件、歷史發展及傳統心理的影響，其物質文化或以商業文化為主，或以農業文化為主，或以交通運輸為主，抑或多元化發展，各自呈現出地方的特色，這些與地方人民息息相關的生存條件，自然也是地方文獻記述的重要資料更為獨具一格之因。近年來，開發文獻信息資源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是信息工作部門十分重視的一個課題，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充分體現了地方文獻對地方物質文化的促進作用。

三是內容廣泛，生動活躍。口述歷史的內容大到重大的歷史事件，或這個歷史事件中的某個側面，小到各個行業中的個人藝技，既有政治、經濟、軍事等內容，又有民情風俗、民歌民謠等內容。口述歷史的形式，既有錄音，又有出版刊物，且口述歷史本身就是聲情并茂，身臨其境，生動感人。

地方文化研究將目光投向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這也是當代民俗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為數眾多的民間故事、民謠、諺語和俗話等等均取材于民間的現實生活，而這些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內容又掌握在廣大民眾的手中，並且通過口述的形式（還應包括文字數據）世世代代地相傳下去，真可謂「取之於民，用之于民，傳之于民」。風俗和習俗自然也不會例外，它們是各階層民眾在數千年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文化慣性。從歷史學的角度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走向民眾（尤其下層民眾）就能夠真實地再現歷史。毋寧說，失去了社會性這一特點，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這一點已為地方文化研究的實踐所證實。事實上，在口述歷史中，主客關係則處於相對鬆散的狀態。在田野采風的過程中，雖離不開個體的講述，但不論是對民俗事象

的臨摹，還是對生活事件、人生儀禮的描述，採訪者和受訪者的身份、經歷、情感等主觀性因素都可以全然隱沒。因為對媽祖、對龍母等神祇的信仰，對生產、生活，以及節日等習俗的口頭傳承，都是在民眾記憶中不知傳了多少代的文化現象。因此，在最終呈現的文本中，主客的關係已為地方文化之集體性掩蓋了。口述歷史的錄音或出版刊物，聲情并茂，更能豐富圖書館館藏的多元化。

四、圖書館如何開展口述歷史工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檔案部門對口述史料收集、保存工作的介入，口述檔案一詞也隨之出現。目前，國際、國內檔案界對於檔案部門應不應參與到口述史料的採集、整理工作中去，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口述史的價值不僅在於再現歷史真實，還在於重構歷史意識。不僅在於描述歷史，還在於解釋歷史。不僅在於佐證與補充舊有的書面文獻資料，還在於發掘新史料。基於此，我們可以從社會心理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尋找處理記憶偏差的有效方法，分析產生記憶偏差的原因，解釋此記憶偏差背後所揭示的歷史意識，使主觀非真實轉化為客觀真實。這有賴於圖書館口述歷史工作者整體理論水平的提高，他們在口述歷史的整個流程上，從訪談對象的確定，到訪談過程的參控，再到訪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對口述史的真實性有著重大的責任。當前，大陸的口述歷史收集與研究現狀不容樂觀，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一，口述史學的真實性或客觀性問題，是口述史學所面臨的一個理論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不僅是中國口述史的問題，也是世界口述史的問題。不僅是口述史的問題，也是整個歷史學的突出問題。中國作為有著悠久歷史和優秀史學傳統的國家，口述史雖淵源流長，但它的真實性一直受到人們的懷疑。其二，資金短缺是口述史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決定了它需要大筆的資金，從外出採訪到購置必備的錄音、錄像設備，從整理口述資料到出版口述史著作，從口述史項目的申請到具體的運作，更甚者，還包括口述史工作者的前期培訓費用，尤其在目前口述史的地位尚未完全確立的情勢下，經費問題成了老大難。口述歷史工作分工不明確，圖書館、檔案館、史學研究機構都在開展工作，存在重複。

其實，收集和整理口述歷史資料有許多方法，由於是實地採集，佈局分散且不規範，在採集前必須制定採集計畫，以避免採集的盲目性，除明確目標任務、近期規劃和長期規劃外，大陸圖書館開發口述歷史資源工作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一)應明確收集口述歷史資料的意義。口述歷史資料不僅可以豐富館藏、改變館藏結構，而且是滿足社會利用檔案數據的需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數據，從口述歷史數據的內容來講，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題材較寬，形式生動，使數據更能適應各類型讀者的閱讀和利用需要。因此，收集口述歷史數據是圖書館工作者的業務和職責。

(二)必須將這項工作列入領導日程，增加資金投入。資金短缺是圖書館開發口述

歷史資源工作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圖書館要建立領導小組和專班，專門抓這項工作。

(三)抓好試點，逐步推廣。我國圖書館工作要在抓好現有圖書館工作的情況下，抽出一定的力量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後，逐步推廣，扎扎實實地抓好這項工作。

(四)這項工作可以與目前檔案的收集工作結合起來，與各單位的檔案工作者共同進行。可以同政協文史工作、黨史工作結合起來進行。將這兩家現有的資料在收集進館的同時，根據他們的資料和館藏以及社會需要，初步確定選題和訪談者，依託各單位和社會力量，分專題和層次進行訪談。這樣就可以少走彎路，少費人力和物力，儘快取得效果。

(五)是培養了一支從事口述歷史資料隊伍，增強了檔案隊伍從事社會調查、資料收集整理等能力。

從事口述歷史資料的人員，既要有本國和世界歷史知識，又要熟悉國內各地風土人物；既要有從事社會調查、群眾工作的能力，又要有錄音及文字記錄整理工作能力；既要有對這項工作的高度熱情，又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建立了檔案與口述歷史諮詢委員會，它的主要歷史任務是：指導及檢討口述歷史計畫，對傳播及教育計畫提供意見，使新加坡的口述檔案工作不斷結出豐碩成果。這樣的機構和職責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口述歷史領導小組除制訂工作計畫（包括宣傳教育在內，還得對各方面進行協調，為專門工作班子創造較好的工作環境。對於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要具備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一定的群眾工作能力，攻關能力的文字工作能力，以適應口述歷史收集工作的需要。

口述史研究隊伍的壯大，一方面在於加強對現有口述史工作者的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工作效率。

(六)注意方法。新加坡口述歷史方法有五條，一是草擬口述歷史計畫大綱，二是與受訪者聯絡，三是初步全面制定訪談範圍，四是錄音訪談，五是訪談打成文稿，六是修正文稿。實際上他們還有第七個方面工作，出版目錄冊和刊物，完成視聽教材，大力提供社會利用，充分發揮作用。這些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不管怎麼說，口述歷史畢竟有著珍貴的史料價值，口述歷史已經成為圖書館收集關於過去信息的一條有效而重要的管道。不管是由圖書館自行開展口述歷史工作，還是接受各種專業機構的捐贈，口述歷史已經向公眾展示了其獨特之處和視角，因為它直接來自於個人的口述回憶，是當事人重新創造和賦予意義的積極過程。也正是由於此，口述歷史作為一種檔案與其他文獻載體的相互補充，為讀者用戶提供了關於過去更加多元化而又非常生動的歷史畫面。

當然，大陸的口述史學研究尚處於摸索階段，問題還有很多，這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認識並提出解決方案。在首屆中華口述史高級論壇暨學科建設會議上，周新國教授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中國口述史學的觀點，並提出了

相關建議；姚力批判分析了目前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困境後，也充分表達了對未來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極大信心，獲得了與會代表的普遍贊同和高度關注。為了加強口述史人才隊伍建設，有關人事部門可考慮在相關的事業職稱類別中設立口述史研究的相應職稱，並通過試點逐步推進這一工作的開展；或者將其納入某一類別職稱裡評審。隨著中國大陸口述史學工作的開展，在條件成熟時，可籌備召開中國口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和世界各國口述史研究工作者展開對話，推動中國口述史研究進一步走向世界，推動中國口述史的研究和實踐進一步開展，並使中國口述史在與國際口述史的交流和對話中形成自己的風格，確立自己的地位，從而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作出應有的貢獻（註17）。

其實，口述歷史在大陸並不陌生，大陸檔案報刊都有報導和論文，他們叫口述檔案。但在圖書館界除了個別開展口述歷史目標管理單位有所發展之外，整個圖書館工作者對這項工作是陌生的。作為個案，大陸汕頭大學圖書館潮汕特藏部的工作是值得大陸圖書館借鑒的。該圖書館在抓好現有地方文獻業務工作的基礎上，逐步開展口述歷史工作，以彌補口述歷史資料的空白。

註 釋

註1 Donald A. Ritchie,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王芝芝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

註2 Willa K. Baum, "The Expanding Role of the Librarian in Oral History," in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 Baum and Dunaway. 2nd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1996), pp.321-340, Originally presented in 1978.

註3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5).

註4 Stephen Thompson, Paul Thompson and Yang Li Wen, "Oral History in China," *Oral History Journal*, England 15, no. 1(Spring 1987): 22.

註5 楊立文,「論口述史學在歷史學中的功用和地位」,北大史學,(1993年6月):120。

註6 楊祥銀,「試論口述史學的功用和困難」,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3月):38-47。

註7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在史學與文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4。

註8 同註1, Donald A. Ritchie, 王芝芝譯,頁416-419。

註9 同註1, Donald A. Ritchie, 王芝芝譯。

註10 林孝勝,「新加坡口述歷史館」,口述歷史,1(1989):231-234。

註11 丁新豹,「香港博物館口述歷史計畫簡介」,口述歷史,1(1989):231-234。

註12 湯普遜(Paul Thompson),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覃方明、渠東、張旅平合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67。

註13 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 David K. Dunaway, & Willa K. Baum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996), p.63.

註14 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5:2(Sep 1998):581-595.

註15 Willa K. Baum, "The Expanding Role of the Librarian in Oral History," in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996), pp.321-340.

註16 宋雪芳、許世瑩，「搶救過去的記憶：口述歷史應用在圖書館之探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0：4(2003)：497-511。

註17 興國、慧超，「首屆中華口述史高級論壇暨學科建設會議綜述」，*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2月)：34-39。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Oral History Abroad and the Apocalypse to Chinese Library

Songhui Zheng

Library
Medical College of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ora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narrated by those who experienced. As for the types of oral history, they are varied. The article looks back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in abroad. After analyzing the problem lying in the history in China, it puts forward to the conferring solu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work will help to save the history, enrich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 resources and serve the readers better.

Keywor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Oral history; Abroad; Apocalypse; Chinese library*